

世

纪

的

回

响

·

作

品

卷

穆 旦

主编 · 李子云
赵长天
陈思和

蛇的诱惑

曹元勇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蛇的诱惑/穆 旦著

ISBN7—80607—173—3

I . 蛇…

II . 穆…

III . 诗文—作品—中国

IV . I·226/207

蛇的诱惑

©穆 旦著

责任编辑:吕唯唯 莫世扬

装帧设计:王震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 7219 工厂

开 本:850 × 1168mm

印 张:9.5 字数:195 千

版 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7—80607—173—3/I·112

定 价:13.3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退厂包换)



良錚

智慧之歌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堆积在你心底的十倍积在内心。

有一种欢喜是青春的豪情，
那是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
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
有的落至脚旁，冰冷而坚硬。

另一种欢喜是喧腾的友谊，
成熟的心不知道还有秋季，
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
生性如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

另一种欢喜是迷人的沉醉，
它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深远，
而理想而痛苦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它终不成笑谈，

穆 旦手迹

编辑说明

一、近年来学术出版界虽已注意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的作品和理论主张,但仍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或别具一格的作家或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或未被发掘,或作品虽经重印,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反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全貌,我们特编选这套丛书出版;

二、本丛书按照文章类别,分辑出版,每辑十本,第一辑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第二辑以文学评论为主,以后将陆续编辑出版以美学、文化争论等方面为主的学术文章。每书有一书名,体现该作家作品的风格面貌,另有一副题,标明作家、批评家或文化群体名称。每书的体例,分总序、本书序、正文及编后记。编后记说明编选者的尺度;

三、本丛书所选文章,一律采用初版本或最初发表于报刊的原始文字。为保持作品的历史风貌,有些作者惯用的语言、某些观点,虽与今天的有所不同,我们仍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四、由于人力和编者学识的限制,~~编选中如有重要疏漏和错误,望行家和读者指正,以期改正。~~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将近八十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八十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八十年中，我们却也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趋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二、三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璨，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忠诚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作家，不管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总是在默默耕耘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吗？

解放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止，历时十四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一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唯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决不凭藉作品以外的力量来招揽顾客。话又说得很谦虚，只说这些作品决不是读了一遍就不想再读的书（其实这已很够了）。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能够重

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的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有鉴于此，在二十世纪即将与我们告别的时候，决定对将近八十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式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分辑加以出版。十本为一辑，辑数暂不规定，看以后的实际情况再定。准备每年出版一至二辑。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受到重视的

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一些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

一个中国诗人^①

(代序)

王佐良

对于战时中国诗歌的正确的评价，大概要等中国政治局面更好的一日。黄河以北一大块土地尚待发掘。模糊地听见的只是延安方面的一些诗人——在战前就建立了声誉的，如艾青和田间，曾试验过一些新的形式，既非学院气息，也不花花绿绿。有人说这些形式大体是民歌的改造，常常还以秧歌作为穿插。这些当然是错误的传闻。而传闻也必须到此为止：我们回到那年青的昆明的一群。

这一群毫不有名。他们的文章出现在很快就夭折的杂志上，有二三个人出了他们的第一个集子。但是那些印在薄薄土纸上的小书从来就无法走远，一直到今天，还是有运输困难和邮局的限制。只有朋友们才承认它们的好处，在朋友们之间，偶然还可以看见一卷文稿在传阅。

^① 此文原载英国伦敦 LIFE AND LETTERS(1946 年 6 月号)，后又刊于北京《文学杂志》(1947 年 8 月号)。《穆旦诗集(1939—1945)》出版时又作为附录被收入。

这些诗人们多少与国立西南联大有关，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一些书，尤其是从外国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这些书现在大概还躺在昆明师范学院的书架上吧：最后，纸边都卷如狗耳，到处都皱叠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特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出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但是对于他们，生活不容易。学生时代，他们活在微薄的政府公费上。毕了业，作为大学和中学的低级教员，银行小职员，科员，实习记者，或仅仅是一个游荡的闲人，他们同物价作着不断的，灰心的抗争。他们之中有人结婚，于是从头就负债度日，他们洗衣，买菜、烧饭，同人还价，吵嘴，在市场上和房东之前受辱。他们之间并未发展起一个排他的，贵族性的小团体。他们陷在污泥之中，但是，总有那么些次，当事情的重压比较松了一下，当一年又转到春天了，他们从日常琐碎的折磨里偷出时间和心思来——来写。

战争，自然不仅是物价。也不仅是在城市里躲警报，他们大多要更接近它一点。二个参加了炮兵。一个帮美国志愿队作战，好几个变成宣传部的人员。另外有人在滇缅公路的修筑上晒过毒太阳，或将敌人从这路上打退。但是最痛苦的经验却只属于一个人，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

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

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因为如果我的叙述泄露了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他的名字是穆旦，现在是一个军队里的中校，而且主持着一张常常惹是非的报纸^①。他已经有了二个集子，第三个快要出了，但这些日子他所想的可能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母亲。有整整八年他没见到母亲了，而他已不再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这个孩子实际上并未长成大人。他没有普通中国诗人所有的派头。他有一个好的正式的教育，而那仅仅给了他技术方面的必要的知识。在好奇心方面，他还只有十八岁；他将一些事物看作最初的元素。

^① 指沈阳《新报》，穆旦任总编辑，1946年5月创办，1947年8月被国民党辽宁省政府查封。

当我呼吸，在山河的交铸里，
无数个晨曦，黄昏，彩色的光，
从昆仑，喜马，天山的傲视，
流下了干燥的，卑湿的草原，
当黄河，扬子，珠江终于憩息……

如果说这是这里有些太堂皇的修辞，那么让我们指出：这首诗写在一九三九年。正当中国激动在初期的挫败里。应该是外在的陌生的东西，在一个年青的无经验的手中变成了内在的情感。

我们的诗人以纯粹的抒情著称，而好的抒情是不大容易见到的，尤其在中国。在中国所写的，有大部分是地位不明白的西方作家的抄袭，因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普通的讽刺是：只有第二流的在另一个文字里产生了真正的影响。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仿，而且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他的焦灼是真实的：

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
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
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
当我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
(那些深情的执拗和偏见，)

主要的调子却是痛苦：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

是这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的。人们猜想现代中国写作必将生和死写得分明生动，但是除了几闪鲁迅的凶狠地刺人的机智和几个零碎的悲愤的喊叫，大多数中国作家是冷淡的。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太飘逸，事实上，没有别的一群作家比他们更接近土壤，而是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死在中国街道上是常见景象，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虚空地断断续续地想着。但是穆旦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一开头，自然，人家把他当作左派，正同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已经超越过这个阶段，而看出了所有口头式政治的庸俗：

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覆
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
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
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我并不是说他逐渐流入一个本质上是反动的态度。他只是更深入，更钻进根底。问题变成了心的死亡：

然而这不值得挂念，我知道

一个更紧的死亡追在后头。
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
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
吞蚀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

就在他采用了辩证，穆旦也是在让一个黑暗的情感吞蚀着：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们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他的五官锐利如刀：

在一瞬间
我看见了遍野的白骨
旋动

就是关于爱情，他的最好的地方是在那些官能的形相里：

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的，我的。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这首诗，对于我，这个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作品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

但是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然而他的在这里的成就也是属于文字的。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澈底的无知。甚至于他的奇幻都是新式的。那些不灵活的中国字在他的手里给揉着，操纵着，它们给暴露在新的严厉和新的气候之前。他有许多人家所想不到的排列和组合。在《五月》这类的诗里，他故意地将新的和旧的风格相比，来表示“一切都在脱节之中”，而结果是，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独自倚栏想

落花飞絮满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穆旦之得着一个文字，正由于他弃绝了一个文字。他的风格完全适合他的敏感。

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上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大多数中国作家的空洞他看了不满意，他们并非无神主义者，他们什么也不相信。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完全传统的。在中国式极为平衡的心的气候里，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我们的诗里缺乏大的精神上的起伏，这也可以用前面提到过的“冷漠”解释。但是穆旦，以他的孩子似的好奇，他的在灵魂深处的窥探，至少是明白冲突和怀疑的：

虽然生活是疲惫的，我必须追求，
虽然观念的丛林缠绕我，